

譚漫云

李孟北



漢書地理志



潭云漫譚

李 孟 北



封面设计：陈 琦

滇 云 漫 谭

李 孟 北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.5 字数：52,000
1979年2月第一版 197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6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751 定价：一角七分

前言

钟 鸿

《滇云漫谭》现在能够辑印出书，这实在是十多年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

回想一九六二年《滇云漫谭》这一组短文在《云南日报》副刊上发表时的情景，还是历历如在目前。作者李孟北同志（《滇云漫谭》发表时署名史常真）当时是《云南日报》的总编辑，我们当时在报社编辑部工作。他在准备写这些短文时曾对我们说过，主要是想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向读者，特别是青年读者，提供一些谈政治理论学习、思想修养、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文章，实指望有助于青年。《滇云漫谭》中的大部分短文写成之后，都经过我们送往排字房，我们是第一个读者。几个做夜班的编辑，往往就《滇云漫谭》中的某一篇原稿，或当时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的某些社会现象，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排字工人同志也来参加，气氛是相当热烈的。有些议论的题目，往往在过了几天之后，就由孟北同志铺衍发挥，写成了文章。作者的写作态度是诚恳负责的。《滇云漫谭》见报之后，许多读者致信编辑部表示欢迎。这是《云南日报》副刊上当时最受读者喜爱的栏目之一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组受到读者欢迎的短文，万万没有想到竟给作者以及一些有关无关的编辑、记者，甚至工人，带来了弥

天大祸。反动文痞姚文元发表了《评“三家村”》黑文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狱，给邓拓同志的《燕山夜话》和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三同志的《三家村札记》定下了可怕的罪名；姚文元在这篇黑文中刀锋一转，也指向了《滇云漫谭》。什么《滇云漫谭》是“三家村”分店，什么“李孟北是‘三家村’分店大老板”，在云南全省范围内，声讨、批判所谓“李孟北黑帮”竟有数月之久。从此，《滇云漫谭》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判定为“大毒草”，作者本人受到残酷迫害，十多年来在我省几乎成为谁也不敢谈论的“禁区”了。

“四人帮”是篡党窃国的大盗。他们疯狂地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，要想陷人于死罪，是什么理由也不需要讲的。你在文章中提倡比较全面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学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知识么，那你就是“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”！你提倡发扬党的传统，善于使用干部，善于团结干部么，那你就是“攻击党不懂得使用干部，团结干部”，你就是“攻击党杀害忠良”，“大刮翻案风”！你主张看干部要看大节、主流，那你就是“影射某一个领导人专抓小节”；而你如果主张在小节方面也应当严以律己，那你简直就是“攻击我在小节方面有问题”了。即便你所说的话全是对的，只要一句“打着红旗反红旗”，也就足够把你的所有的正确，全部彻底地推翻了。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！他们黑白颠倒、是非混淆，比权奸、卖国贼秦桧还要坏上千万倍，秦桧杀害岳飞，只是油腔滑调地说上个“莫须有”，他们则是杀了人还要强加上千百条“该死”的罪名，是地地道道的希特勒！

历史毕竟不是姚文元这样的丑类所能够玩弄的。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，拯救了中国人民。尽管《滇云漫谭》所引起的这一桩

冤案，比起中国人民所经受的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浩劫来，比起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成千上万的老同志所受的苦难来，是微不足道的；但是，正如每一根小草同样承受着雨露的滋润，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关心着每一桩大小冤案、假案、错案的平反，中共云南省委为“三家村云南分店”彻底平反了。在党的阳光普照下，《滇云漫谭》也恢复了本来的面目。它的出版，作为对“四人帮”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控诉，作为对我们伟大、亲爱的党的歌颂，是一件使人庆贺、使人高兴的事。作者，还有我省新闻战线的同志们，都从这里受到了鼓舞和激励。在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，大家一定会更加倍地努力，作出应有贡献来的吧！

二月三日

目 录

牛.....	(1)
熟能生“流”	(4)
刘邦给项羽做的总结.....	(7)
特殊的耳朵和鼻子.....	(10)
晚 学.....	(13)
马.....	(17)
称 呼.....	(20)
谈“小节”	(24)
再谈“小节”	(27)
从程咬金说起.....	(30)
“立竿见影”	(33)
日常真理.....	(36)
登徒子何尝好色!	(39)
谈果木.....	(43)
静与思.....	(46)
劳动不负苦心人.....	(49)
山不在高.....	(52)
“制怒”! ?.....	(55)
源远流长.....	(58)
象 征.....	(61)
多翻一翻笔记.....	(64)
欢迎平时严格.....	(67)
从“洋芋”谈起.....	(70)
后 记.....	(73)

牛

昨天是夏历六月二十四日，按我省许多地方的习俗，这一天是火把节。关于火把节的传说很多，一般都因民族、因地区而有不同。白族传说是纪念邓赧诏的柏洁夫人；滇池一带则认为是纪念坚贞不屈的阿南姑娘；撒尼人则传说是把火把捆在羊角上来制服恶人；纳西族则传说烧火把是哄骗天神，以免人间遭难。来源虽大不相同，但这几天都要休息休息，或唱歌，或跳舞，或聚餐，或斗牛，则是一致的。六月二十四日已快到立秋，从农事活动看，秧已基本薅完，地已铲完，早荞早洋芋也已收下来了，而秋收大忙还未到，正是劳逸结合的好时机。我想这一节日，流传时间如此长，节日活动如此广泛，是和时机有一定关系的。

值得感兴趣的是节日活动的内容，除跳歌、跳乐之外，在路南撒尼人、寻甸彝族中都盛行斗牛；在楚雄彝族中，还要杀鸡祭牛厩。斗牛、祭牛这是和生产联系较深的一种活动。听人说：斗牛实际是精选良种的一个方法。至于杀鸡祭牛厩则完全是为了牛羊兴旺。听听这些活动，不禁使人想到：即使在这个以“逸”为主的节日里，农民总忘不了牛。

牛和农民的关系是至深至切的，人们对牛的印象是很好的。古人今人对牛的评价都很高，司马迁的《报任少卿书》，第一句就是：“太史公，牛马走”。“牛马走”，是自谦之词，形容自己象牛马一样勤恳忠实地对待朋友。我国伟大文学

家鲁迅的名句则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把自己形容象牛一样为人民服务。可见自古以来，牛是为人民服务得很好的。因此，人们关心它，爱护它。

在我省有些彝族地区，把夏历二月初八列为“牛王会”，和火把节、春节并称三大节。到这一天，要为牛马招魂，还用鲜红的马缨花扎成花圈套在牛脖子上，在牛厩前，则搬上一块粑粑，上面插上一朵大红花。在一些分散的山区，至今还把牛人格化。在他们修建的小山神庙中，一般都挂着画像。画像的主位的神是骑牛的，有的神像还是牛头人身的。这些山神庙，实际是牛王庙。在科学知识不很发达的情况下，人们这种习俗，深刻反映了牲畜——特别是牛与农业生产的关系。牛，既可以耕田，又可以运输；不但可以积肥，而且可以食肉。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，它是农业生产须臾不可离的。

明朝经营云南成功，其重要原因是采取了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。而屯田之政能够坚持产生效果，明王朝用牛来支援屯田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“洪武二十年八月……丙寅，遣右军都督金事孙茂，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耕牛万头，时将征百夷，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。”（太祖洪武实录）

“洪武二十三年……六月……乙丑，给云南诸卫屯牛。先是延安侯、唐胜宗等往云南训练军士，置平溪、清浪、镇远、偏桥、兴隆、清平、新添、隆里、威清、平坝、安庄、安南、平夷十三卫守，而耕牛不及，胜宗数请以沅州及思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，分给屯田诸军，至是，诏给与之。”（太祖洪武实录）

这材料表明，明初从四川、贵州调进了相当数量的耕牛。云南的牛，数量本来是很大的，据《滇海虞衡志》载：“马牛羊不计其数，以群为名，或百为群，或数百及千为群，论所有，辄曰：某有马几何群，牛与羊几何群？”这个记载有些夸大，

而牛多，则为事实。但明朝仍然调进耕牛，可能由于数十万军队，一齐动手开垦田地，耕牛未经训练，完全取之于当地，为数不足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牛的使用和发展，是当时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的重要支柱。

直至今天，牛仍然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。从云南看水稻生产，第一是水，第二是牛，特别是有了水之后，牛的需要就更迫切。尤其是，云南的一望无际的平坝不多，梯田不少，至于山地则更是多在陡坡上，在今后一个十分长的时期内，使用牛力是必不可少的。因此，搞生产，必须切切实实发展牛的生产。发展牛的生产，既要坚决贯彻政策，又要采取一系列措施。应当注意发扬各地原有的一些好传统、好办法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高饲养放牧人员的地位。饲养放牧人员的积极性，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牛羊的发展。以牲畜多出名的寻甸县河口区，有一种“祭山”的习俗，“祭山”实际是放牧员的节日。我们把这段材料记在后边：

“河口一带，放牧员历史上还有‘祭山’的习俗，约在夏历正月初五或初六这一天，全村子的放牧员聚集在一起，喝酒吃饭，高高兴兴地欢乐一天。前几年，窑房生产队恢复了“祭山”活动，到这一天，生产队给全村放牧人员放假一天，还给一只鸡、一斤白酒、一些黄豆和豆腐，每人一斤大米，让他们在一起聚餐。这个办法对鼓励放牧人员的积极性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”（调查人：张廷干、贺世熙）

这段材料，有力地说明，关心牲畜的发展，首先要关心放牧的人，不仅要有物质奖励，而且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，搞农业生产的同志决不可忽视。

熟 能 生 “流”

“熟”，这个字，是个好字。熟悉、熟练、熟谙、熟知、成熟，等等，都是好意思。一提到熟，很容易联想到熟能生巧。在纸烟厂里，见到过一些装包工人，他们抓一把香烟，不多不少正是二十支，然后一下子装进烟盒里；那些善于切肉的，一刀下去，要半斤就是半斤，要一斤恰好一斤，也是不多不少。每每看到这些熟练的动作，都不禁佩服赞叹。总觉得：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只要长期实践，就能够产生新的体会，新的见解，新的本领。

最近看到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的一篇文章，题目很别致，叫《三分生》，文中几次提到“熟能生流”、“熟能生油”，这个提法很新颖，颇能引人深思。他主要是讲唱戏，现在引一段原文：

“比方说，今儿派你的戏了，‘武家坡’，你来王宝钏。王宝钏？怎么又——是王宝钏，熟戏，老掉牙了，甭我唱，听主耳朵里都要起膈子了，‘忽听大嫂一声唤’，谁不知道！得，既派在头上了，唱吧，没精打彩地往扮戏桌一坐，拍彩勒头贴片子，换行头，上场门一站，外场搭完了架子，‘来了’，随着小锣出去了……。戏唱下来了，听主没说好也没说坏，按说活是交代了，可是，跟没唱一样。怎么说呢？自打你存了那个‘又——是王宝钏’的念头开始，这出戏已经注定了就是那么回事了，观众眼睛可尖着哪，你挑帘一出来，一看你那份心里满没事儿的神气，观众就明白了：又是她，某某人，又是那么一道汤，对付着听吧，客气呢，到该喊好的时候应付一嗓子；不客气呢，乘这空儿去喝口水抽

根烟。也许你还在台上纳闷呢，今儿怎么个磕儿，直抽签儿？台底下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其实台底下没出事儿，是你这儿出了事儿了！这叫做‘你又他也又，你熟他也熟’，坏就坏在这个熟字上了，熟能生流。”

这段话虽然讲的是唱戏，却有它的深刻处。熟是可以生巧的，但熟不一定准生巧，熟还可以生“流”、生“油”。熟可以引导到巧，但是，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巧，这里有一定的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主观的态度和努力的程度。因此，荀慧生主张演戏要保持“三分生”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“……只要你每次都对人物有陌生的感觉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许多细小的过节没注意过，这些新发现就会引着你往人物深里头去。”这是说，演员要不断地深入地探索所演的人物的性格感情，并用适宜的动作、唱腔、表情表达出来。探索的过程，是认识深刻化，不断发现新东西的过程。演员对人物的理解，应当无尽期的，那么，也就是永远要有新鲜感觉的。我揣摩，他的话可以这样解释。

不只唱戏，办什么事都好，从熟到巧，从陈到新，都必须抱有正确的态度。毫无疑问，在这里熟是十分重要的，熟，就是对事物的基本情况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，没有这一点，是什么都谈不到的。但是，熟练了，熟悉了，还并不等于就是巧了，从熟到新、到巧，还必须有一番主观上的努力。在这个历程中，最大的敌人是：自满和满足。荀慧生所比方的那个演员，之所以演出失败，之所以熟而生流，就在于她自认为王宝钏这个人物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琢磨之处了。满必然生流。我想是这个演员失败的主要原因，也是人人经常值得鉴戒的地方。

对客观事物的认识，应当是永无尽期的，因为事物不仅是广泛的，浩繁的，而且是不断地在变化当中。我们说熟悉某一

种事物，这只能是相对的、暂时的。同时，从一般地熟悉一种事物到掌握它的本质，也并不是容易的。仅仅熟悉了现象，并不能算作对这一事物熟悉了。尤其是我们目前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是一桩崭新的事业，经常保持谦虚的态度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去实践，并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才能逐步熟悉起来。因此，“三分生”还不够，还应当经常保持“七分生”甚至“十分生”的态度。这样，对于学习建设的本领大有益处。

刘邦给项羽做的总结

项羽的穷途末路是人们所熟知的，但是，为什么一代霸王竟弄到“别姬”的地步呢？这一点，项羽自己，是至死也不悟的。他在被困垓下的慷慨悲歌中，曾认为是：“时不利兮骓不逝”；及至到了乌江自刎前，还认为：“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”，总之，原因是客观的，他自己没有什么缺点。不去从主观上找原因，反而事事推到客观上去，这种态度本身，就是霸王的悲剧的根源。

那么，项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哪些呢？总结却是刘邦替他做的。刘邦在打败项羽之后，召集他的群臣，采取“皆言其情”的办法，总结汉胜楚败的基本原因，最后由刘邦自己作结论，他有一番很值得深思的话，他说：

“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、抚百姓、给馈饷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肖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人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

这一段话是很精辟的。虽然，汉胜楚败的主客观因素是比较多的，譬如：刘邦采取了比较适合当时人民要求的政策，建立了关中根据地等等，但是能够用人，能够团结人，则是刘邦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也是项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这一点不仅是刘邦的经验，也是历代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。

刘邦的善于用人，是历史事实，在当时，“三杰”之一的韩

信，也很佩服他。有一天刘邦与韩信谈论各个将领的带兵能力，同时也谈到了他们两人的带兵能力，有一段很生动的对话：

“上问曰：如我能将几何？信曰：陛下不过能将十万。上曰：于君何如？曰：臣多多而益善耳。上笑曰：多多益善，何为为我擒？！信曰：陛下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。”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）

在这一段对话里，韩信把经验集中在一点：“将将”。善于将将，也就是善于用人，善于使用干部。楚汉之争的相互消长的过程，就是楚的优秀干部日益减少，汉的优秀干部日益增加的过程。韩信、黥布、彭越等这些大将，张良、陈平等这些谋士，原来都是项羽的部下，后来都投向了刘邦。那么，项羽不失败，则是没有道理的。从刘邦使用的人来看，的确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：其中有贵族子弟，张良；有小官吏，肖何、曹参；有“贫无行”的韩信；有“不视家生产”的陈平；有以“屠狗为业”的樊哙；有“贩缯者”灌婴；有“番将”梅锱等等，确乎才能多样。这一事实，充分说明了刘邦能够广泛地团结人。

刘邦的能够用人，是否一开始就自觉呢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刘邦这个人的脾气不怎么好，人们对他的印象是“慢而侮人”。“肖何月下追韩信”之所以出现，就是因为韩信认为刘邦“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，如呼小儿耳，此乃信所以去也”。但是，在斗争的过程中，刘邦能够以他自己的事业为重，克服他的弱点，后来才能“礼贤下士”。他对待酈生的事，最能说明这一点了：

“沛公至高阳传舍，使人召酈生。酈生至，入谒，沛公方踞床，使两女子洗足，而见酈生。酈生入，则长揖不拜，曰：“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？且欲率诸侯破秦也！”沛公骂曰：“竖儒！夫天下同苦秦久矣，故诸侯相率而攻秦，何谓助秦攻诸侯乎？”酈生曰：“必聚徒合义兵

诛无道秦，不宜踞见长者。”于是，沛公辍洗起摄衣，延酈生上坐，谢之。”（《史记·酈生、陆贾列传》）

在开始时，刘邦是个“不好儒”的，也就是很不喜欢知识分子，他甚至把当时知识分子所戴的帽子，拿来当溺器。但是，他没有继续放纵自己这个偏见和缺点。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个人情感好恶，足以危害自己的事业时，就收敛它改变它，使之适应自己事业的利益。不难看出，刘邦能够团结人，并非他在性格上有什么天生的长处，而主要是，他从他的封建帝王的事业的利益出发，服从他的事业的利益，来制定他的干部政策。

在过去，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正是由于党培养和团结广大的干部，团结了全国人民；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同样需要团结全中国人民，需要团结各阶层人民的代表人物，需要团结广大的干部，也就是，仍然需要团结人。团结人是胜利的保证。在待人和团结人当中，重要的，是不能从个人的感情好恶出发，而应当从党的政策出发。党的政策，集中代表了党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、社会主义的利益。不管个人在感情上怎样不喜欢这个人，都必须依据党的政策去待人去团结人。只有这样，才符合党的事业的利益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。正象俗话说说的：“人上一百，各种各色”，各种各样的人，都有各种各样的优点，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，因此，不能从个人感情出发去对待干部。应当善于用他们的优点，克服其缺点。我们的事业有着广泛的团结人的基础，我们以“为人民服务”为目的的人，完全有可能去广泛团结人，我们应当多做人的工作，把人团结得越多、越牢固，胜利就来得更快。